

掘港兴灯

□赵一锋

兴灯是过去的一种综合性民俗活动,最主要的是行街表演,由彩牌、肩挑、打莲湘、舞狮子、龙灯、跑旱船、泼花篮以及各种灯组成的队伍。解放前掘港街上兴灯一般是正月十五元宵节,后来有什么“运动”庆典也“兴灯”,掘港街上最后一次兴灯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

过去兴灯各大商家如赵永升、广隆、德昌祥、洪同泰等都要扎制彩灯,这些灯一般都是请人扎的,用竹子做骨,好一点有木头的,最好的还有红木骨,这些灯都是可以拆卸的,用的时候拆装再表演就行了。笔者曾祖父云程公是镇上扎彩灯的高手,1949年应掘港粮食公所邀请为“开国庆大”扎制花灯,有“羊子乍角灯”“猴子盘桃灯”“天女散花灯”等,都是大型彩灯,有真人大小,蜡烛一点,热气一腾,人物瑞兽都能活动,活灵活现、栩栩如生。笔者小时候听祖父、父亲讲过“羊子乍角灯”“猴子盘桃灯”的制作和故事。“羊子乍角灯”用竹子扎羊的身子,以瓢儿做头,大小和真羊差不多大,用竹竿挑着,线一拉,两只羊就碰到一起“乍角”,很是有趣。曾祖父有一次扎好

了“猴子盘桃灯”,有好事者看了说“猴子盘桃有猴无毛”,太爷爷给猴子粘上猴毛,很是花了一番功夫。好事者又说“桃子虽好叶子嫌少”,太爷爷又加了好多叶子,最后大家看了很满意,好事者也无话可说。

兴灯的队伍那时候的纪律很好,都听从统一指挥。

“彩排”打头阵,掘港街上的“彩排”解放后是搬运工会的,是用红木打制的,像牌楼一样,三米多高、三四米宽,一格一格镶嵌玻璃,里面装彩色的灯,上面挂铜铃铛,有三四百个,大的如拳头、小的如眼珠,走起来发出“丁零当啷”的声音,很有节奏。“彩排”得有十几个身强力壮的大汉扛着走,他们都是搬运工人,但走一条街也要换人。扛彩牌光有力气还不行,得走得威风好看,应和鼓点和铃铛声,彩牌后面有伴奏的“十番”锣鼓。掘港街上扛彩牌最好的是东街烟墩场的虞汉渭,人称“虞家羊子”,最后一次扛彩牌时已经六七十岁,扛了一段就不得不歇歇,岁月不饶人呀!

给彩牌伴奏的是十番锣鼓,这些锣鼓是安放在木头架子上的,有十多米长,人抬着,笙、箫、管、笛、胡琴、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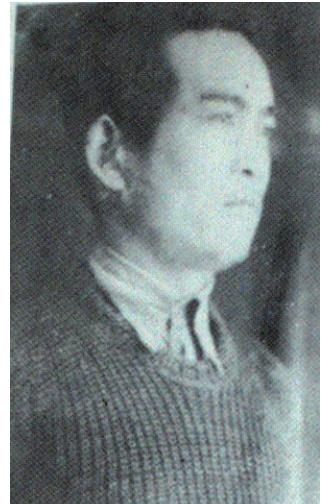
琶、三弦跟在左右,曲调悠扬,起到压阵的作用,掘港有句歇后语:掘港人打的十番——不紧不慢。这些演奏的人来自各行各业,以理发业的为多,都是“要友”。这些人演奏技艺高超,起码得十多人,韩信点兵多多益善,最多可达小一百人。但掘港街上最后一次兴灯,老艺人都年纪大了,不能演出,还请了马塘的几个师傅来演出。

十番锣鼓后面是肩挑,肩挑就是几个人高马大、身强力壮的大汉,肩膀上扛一个铁架子,铁架子上站一个或者三个五六岁的小孩,小孩扮作各种戏剧人物站在铁架子上。下面的大人得走“官步”,一步三摇,很是威风。绑肩挑是很有讲究的,绑得不好,下面的大人和上面的孩子都要受伤,铁架子有四个柱子,正好齐腰固定在人身体周围,有架子扛在肩膀上,走累了就用手扶着柱子。小孩两条腿穿在一个大裤管里站在铁架上,另一个假腿跪着。有观看者不明白:小孩子跪着腿累不累?扛肩挑的得意地说,给孩子吃得饱,不累!这个秘密很多人至今不知道。肩挑上最多可以扛三个小孩,下面两个,上面一个,这很考验扛的人的体力,走一段就得换人。有指

挥的,肩挑者一示意,指挥者喊“小”,肩挑者蹲下,马上有另一个接替。肩挑是有危险的,肩挑旁边都有人用两根长毛竹竿隔离出很大的空间,确保安全。由于安保措施到位,掘港肩挑从没有事故发生。最后一次兴灯,围观的老百姓把隔离的毛竹都挤压断了,肩挑不得不中止,老百姓骂声一片,但为了安全还是中止了,从此掘港街上再无肩挑。

肩挑后面紧跟的是打莲湘、舞狮子、龙灯、跑旱船、泼花篮,接下来就是各商家做的灯:粮食行的羊子乍角灯,八鲜行的荡船、河蚌精,茶食店的嫦娥奔月,百货业的荷花担子、花担子、茶担子等等。因隔行如隔山,各做各行。茶担子常常借用大户人家的花瓶、珊瑚、田黄石等作为茶担子上的“奇珍异宝”,一般是爱护有加,生怕有闪失。

20世纪70年代末掘港街上最后一次兴灯,大概是为了纪念什么活动,由住在黄家墩儿的某领导组织。由于已经歇了二十几年没有兴灯了,为了彩牌、肩挑准备了半个月,到南通添置了好多道具,那次以后掘港街上就再也没有传统兴灯了。



“锄奸模范”壮士王范

□陶建明

王范(1905—1967)又名王凡,原名张庭普,如东人(现如东县曹埠镇)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参加红十四军,失败后辗转上海当巡捕,参加中央特科工作。1937年赴延安,任边区保安处副处长,因打击敌特有功,被毛泽东称为“锄奸模范”。上图左起:20世纪30年代末在延安保安处的王范,1941年王范与夫人李仲培在延安,1960年王范和李克农在一起,最右图片上:王范和李克农在一起,下:1965年王范全家合影。

王范自幼家境贫寒,10岁时才上私塾,三年后辍学。青年时代的王范,身强力壮,体力过人。1926年,在中共党员王盈朝的教育引导下,王范走上了革命道路,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0年4月,他参加了红十四军,参与打土豪、分田地。在战斗中他英勇顽强,敢打敢拼。红十四军失败后,王范为避开敌人的追捕,不得不泅水逃走,经南通来到上海。

红色“包打听”

王范来到上海后,举目无亲、身孤影单,衣食住行、生活艰难,为了糊口,他化名“张云飞”,到黄浦江边码头上干苦力。好打抱不平的王范连换了几次工作,吃了不少苦头。在上海寻找党组织未果的情况下,王范决定去投考巡捕。他凭着壮实的身体和拳脚功夫顺利地考上了巡捕,参加集训6个月后,被分配到租界界四马路(今福州路)巡捕房当巡捕。王范利用巡捕的身份,广交朋友,又主动与地下党组织接上关系,接受组织的政治考验,向党组织提供情报。

1930年6月,中共中央特别行动科红队决定除掉叛徒白某。白某原是上海西区地下党的交通员,被捕后自首叛变,多次在上海街头指认或跟踪我方同志,造成多人被捕,危害严重。红队负责人了解到此人生性多疑偏又贪淫好色,常去四马路一带眠花宿柳,决定由王范利用巡捕的有利身份,设法监控叛徒,并及时通风报信。

一天晚上,上岗巡行中的王范突然发现叛徒白某从美琪大戏院门口小巷钻了出来,坐上黄包车去了浙江路。王范立即叫人跟踪盯紧。当获悉白某进入妓院春江楼后,王范立即打电话用暗语通知了红队,红队七八名便衣队员迅速出动,包围了春江楼,干净利落地干掉了叛徒。

7月的一天,几个穿和服携刀棍的日本浪人越过海宁路口租界区铁栅栏,闯入一瓜果店,又打又砸,殴伤店主。两巡捕冲上前制止,与日本浪人发生争斗。日巡逻小队不问情由立即开枪,造成巡捕一死一伤。英方工部局交涉软弱无力,日方拒不交出杀人凶手,气焰嚣张。王范号召巡捕们罢工,以示强烈抗议。他还发起了声势浩大的出旗游行,在跑马厅登上台发表演讲,历数日军罪行,振臂呼口号。

11月,王范正式恢复组织关

系,并被任命为四马路巡捕房党支部书记。

1934年4月,因沪中区委宣传部负责人被捕叛变,致使一些地下党员相继被捕。在四马路执勤的王范被叛徒认出,不幸被捕。王范先前发动沪上巡捕游行罢岗时,在地下党秘密联络点与此人曾见过面。王范被捕时化名张景庆。当天晚上,在巡捕房的地下刑讯室里,王范大声叫屈,坚决否认自己是共产党员。3天后,王范被引渡到南市区的上海警察局。敌人对他施以酷刑,几次昏死过去,被刑讯人员用水喷醒后仍不招供。无奈之下,敌人叫来叛徒对质。

王范一见到叛徒,便先发制人,大声呵斥,并告诉提审人此人曾在四马路上公开调戏青年妇女,被自己拦下来狠狠地训斥过一顿,因此挟嫌报复。他又利用叛徒不知道他的名字的情况,故意问叛徒自己的名字,叛徒当然说不出来。敌人见审不出个结果,一时无计可施,又不甘心将王范释放,便以“共党嫌疑犯”的名,判刑押往南京,关押在中央陆军监狱。

延安的“锄奸模范”

在监狱里,监狱头目见王范力气大,能挑能担,又只是嫌疑犯,故令他挑水担菜,并给监房送饭。王范利用这个机会传递信息、保护难友。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9月,国共两党再次合作。经八路军驻守办事处与国民政府交涉,王范与难友们得以无条件获释。

1937年10月,王范改名王凡,被派往延安。先进入中央党校学习,担任党总支的组织委员,半年后,调入陕甘宁边区政府保安处,从事政保工作。王范机智勇敢,在担任边区保卫处副处长期间,他配合处长周兴,开展与敌特的斗争。

平时,周兴坐镇边区保卫处指挥全局,王范则主动出击,摸情况找线索。他平日不穿军装,喜欢穿上海工人常穿的藏青布工装,头戴一顶鸭舌帽,常在化装后深入民间,还在边区民众中发展了一些眼线,以利于了解敌特活动情况。经过一段时间的侦察,他发现延安城外的麻家铺有个已还俗的僧人行踪可疑,常不定期地与一名叫谢仁义的小杂货店老板接头。谢仁义则不定期去七里铺乡镇小学,与一个姓张的小学校长接头。为了不打草惊蛇,周兴与王范派出保卫人员对

暗中监视布控。同时,李克农也转告边区保安处,中央军委的电台曾两次截获发自延安城外的可疑电波信号;而绥德县的一个天主教堂附近已被测出有敌特的秘密电台在活动。保安处据此分析,敌特很可能在策划一起重大破坏行动,甚至是武装暴乱。

党中央要求边区保安处密切注视敌特动向,把握好动手的时机。王范立即带人前往延安郊区排摸情况,在掌握了一些证据后,他当机立断,秘密逮捕了谢仁义和小学校长等7名特务,当场击毙拒捕的还俗僧人。经过突击审讯,王范得知特务们与延安城外一股东地主武装联合起来,策划破坏延安通往绥德的公路,并阴谋伏击八路军后方留守处主任萧劲光一行;他们还计划潜往枣园、杨家岭等地,向毛泽东与中共中央驻地的几口水井投毒,以暗杀中央领导人。已被捕的国民党延安县长周景龙还供认,军统已派了一名杀手潜入延安,计划杀害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但此人迟迟没有动静,不知是出了什么差错。

周兴、王范立即向中央作了专题汇报,并与负责党中央警卫工作的杨奇清、汪东兴碰头,制定保护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措施。他们布下天罗地网,国民党特务们还没来得及下手就被一网打尽,在我方严密大搜捕中,有30多个被擒,其中有混入革命队伍的敌特奸细9人。1939年延安破获这件敌特大案后,党中央、西北局先后对王范予以表彰和奖励。毛泽东在中央一次内部会议上还点名表扬了立下首功的王范,称他为“锄奸模范”。在延安,王范也收获了爱情。1941年7月,王范与李仲培在延安结为夫妇,著名教育家徐特立为他们做了证婚人。

1949年初,王范到中共中央所在地——河北平山县,向中央社会部汇报工作。中央社会部李克农要他在北京西郊侦察肃匪,为党中央、毛主席进北京做好准备。他愉快地接受了这一重大任务,担任中央社会部工作队队长。

北平和平解放时,敌情十分复杂,王范夜以继日地深入基层实地查看、调查研究,为党中央机关及领导同志安排住

地,布置警卫,制定详细、严密的保安方案。1949年4月,当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进入北平时,王范乘坐第一辆汽车在前面开路,沿路秩序井然,胜利完成了安全保卫任务。

1949年5月,渡江战役开始,王范考虑到自己曾在上海从事过党的地下活动,情况比较熟悉,即向领导提出到那里去工作。经领导批准,王范带领20余名社会部保卫干部,日夜兼程从北京抵达华东首脑机关驻地丹阳,接受进沪后的安全保卫工作任务,立即着手组建中共中央华东局保卫处,并任处长。1949年5月25日,上海解放。硝烟未尽,他率领保卫处干部、战士进入这个“冒险家的乐园”,迅速迎头痛击公开和暗藏的武装反革命分子,担负起保卫工作。当时,国民党的“反共救国军”活动十分猖獗,敌人还从海外派遣由特务头子戴笠、毛人凤培植的亲信、“暗杀老手”“保密局上海直属行动组”上校组长刘全德等人潜入上海,准备暗杀陈毅市长及华东局领导同志。反敌特工作任务十分艰巨。王范积极配合公安机关,经过缜密侦察,终于将刘全德等“反共救国军”特务一网打尽,确保了华东局党政机关及领导的安全。

1950年初,王范调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公安部副部长,分管政保工作。1950年夏,一名由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局长毛人凤点名指派的“心战专家”、代号“083”的高级特务秘密潜入内地,企图利用当时局势,培训和指导上海、南京两地的国民党“保密局”潜伏特务在内地进行“心战”活动。接到中央指令后,王范迅速组织精兵强将,亲自担任专案组组长,主持083专案的侦破工作。经过缜密侦察,迅速查明083的行踪,在其还未实施活动前成功将其抓获归案,粉碎了敌人的阴谋。

1955年王范任上海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1956年1月10日,毛泽东主席视察江南造船厂时,发现延安时期曾在他身边工作过的王范同志也来陪同他视察,亲切地问他:“你现在在哪里工作呀?”陈毅风趣地向毛泽东主席介绍说,他是上海的“包打听”(上海市检察长)呀!毛主席听了哈哈大笑。

1962年王范调任江苏省体委主任。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王范公开否定“文化大革命”,写信批评毛泽东主席“通行一条错误路线,受坏人利用”,受到严重迫害。1967年1月12日,王范在家中留下一份言辞激烈的绝命书后,自杀身亡。1978年4月中共江苏省委为他平反昭雪。时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黄火青为其题词“党的忠勇壮士王范”。



青年张謇爱猜谜

□安铁生

张謇先生自幼刻苦学习,故文学功底十分深厚,且擅长诗歌、楹联、书法等,南通博物苑曾专题办过他的诗联墨宝展览,后人亦出多本论文探讨研究。而鲜为人知的是张謇先生年轻时,还喜欢与文友玩增知益智的猜谜游戏,这在他的日记里是有明确记录的。例如,在张謇先生23岁时,光绪二年(1876)十月二十二日:“至海秋处猜诗谜,三更就寝。”二十七日:“于子承、礼卿灯下猜诗谜。”(见《张謇全集》第8集《柳西草堂日记》第95页)

我们知道古人猜谜,题材很多且深奥,浅的有孩童初读的《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作谜底,深一些的有四书五经、《六才子书》和唐诗宋词等。张謇先生在上述两天日记里都谈了“猜诗谜”,应该主要是猜诗里某句作底的谜,因为灯谜是曲径通幽的文学变化游戏,且有一字多义转折多解之妙,不是对《诗经》等十分熟悉或背熟如流,是难以猜射出来的,足见后来能考中状元的张謇先生,古典文学基础十分厚实。日记里他还谈到“灯下猜”,说明那时都是晚上去的,这与我们现在常在广场大厅白天猜,意境氛围是大不一样的,那才是名副其实的“灯(下)猜”。更叫人称绝的是,光绪二年(1876)十月二十二日的猜谜,苦思冥想的时间很长,也可能难度很大一直玩到半夜“三更就寝”,可见其考虑甚多、非常投入。笔者爱好灯谜游戏60余年,也在夜间参加谜会多场,从未到这么晚。在猜射难度大的情况下,张謇先生仍乐此不疲、全神贯注,追根溯源,甚至有股不能猜中决不罢休的韧劲,可见其入迷程度。

在《张謇日记》第8集148页中,我还找到其26岁时,“光绪五年(1879)三月五日:‘宝山王薄招饮,射覆。’六日:‘少云招饮,射覆。’”现在很少有人知道“射覆”且不甚理解。其实射覆是古代流传下来的卜卦猜谜游戏。射覆游戏历史十分悠久,射是猜测的意思,覆是覆盖的意思。早在汉代时期已经流行于皇宫中,在碗、瓯、盂等器具下覆盖某一个东西,大都是些生活用品,如手巾、扇子、笔墨、盒罐等,口头念出或写出一段隐语,多与易学八卦有关,让人猜测里面具体是什么,类似于现在的实物猜谜。后来的射覆也逐渐改变。现代的“射覆谜”还留有古代射覆的痕迹,但已改为一种构词联想式的填字游戏,以隐含文字为主,属于文义谜的一种。在猜射时,以上一字与下一字彼此关联,常取“用上覆下”的猜射方法。如谜面为“李□□广”,李广是西汉时期名将,要求在中间空格填入我国著名电影演员的名字,并使前两字为唐代大作家名,后两字又为隋代名人。答案是白杨(“李白杨广”)即李白、白杨、杨广)。当然,张謇先生那个年代,是不会有这么简易的“填字游戏”的,一定奥妙复杂且难度相当大,只有文学功底深厚又联想丰富、思路敏捷者,才能玩得得心应手。这种人当然也是学识丰富的人了,张謇先生当属此列。

传家宝

半张高冠华 一树玉兰开

□苇航

约在三四年前,同乡朱云向我述及他的夫人家——南通冯氏结缘画家高冠华的往事。至今,他的家族还虔诚高冠华的一幅精品画作《杏花春雨江南》。高冠华(1915—1999),南通人,曾为中央美术学院教授,著名美术教育家。他的画作,今日已是名人翰墨,不易入藏。未料“说曹操,曹操到”,就在欣闻冯家藏画后数日,一位书商向我兜售高先生的旧作。他未知高氏大名,索价颇廉。我请吴丑禅、李夏荣两位友人寓目,虽非精品,真迹无疑。我赶忙付钱换画。

那幅画作,原本铺在框架中,经年累月,保存不妥,两处对角已略有水渍。更令人遗憾的是,端详画中花儿造型,这幅画下半张已不知所终。所余上半幅《木笔花》为大写意。潘天寿先生是画坛巨擘,大写意高手。作为潘先生的高足,高冠华当然善作大写意花鸟画。半张《木笔花》布局疏密得当,处处充满鲜明对比:两根主枝,一细一粗,互为平行,斜着向上,枝上枝下缀有红花。两枝又有叉枝相连。上枝稍远,绘有较小的三枝花骨朵,或包紧,或待放;下枝最近,深红花瓣大有小,姿态各异,黄蕊星星点点,或近于枝边,或露于瓣中,尽显全然绽放的美感。画面右侧,补入淡墨所绘簇簇竹枝竹叶,既是补白,又于远处黑枝红花,形成用墨浓淡、色彩艳丽的强烈对比。下枝尽头,即画面左上角,补入一只小雀:褐色尖嘴,淡栗色的圆头、弧背、扇尾,灰色腹毛,黑色细腿,栩栩如生。最有情趣的是,小雀的嘴儿,完全张开,吱吱鸟声,仿佛已入人耳,与花儿的静态又形成强烈的对比——“花香鸟鸣喜报春”的意境,跃然纸上。

幸运的是,半张《木笔花》尚有落款:“一树木笔开,冠华写。”钤印两方,其中一方为名字白文印:高冠华。另一方为起首印:“忙中草草”。李夏荣兄追忆,高先生早年在南通地摊上购入这幅闲章,很是钟爱,画中常钤。他曾馈赠两份画稿给李夏荣,画中也钤此方“忙中草草”。

这幅画作,兴许是“草书旧作”,又剩半张,收藏价值,不比高冠华的精品力作,不过对我,有着别样的意义。画中主角木笔花,即辛夷花,又名望春花、广玉兰、白玉兰、紫玉兰。广